Modern Linguistics 现代语言学, 2026, 14(11), 57-63
Published Online November 2026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ml
https://doi.org/10.12677/ml.2026.14111047

Hans汉斯

汉语“正”字计数与欧美计数符号的文化差异比较

何伊蕊

四川大学文学院，四川 成都

收稿日期：2026年9月22日；录用日期：2026年10月27日；发布日期：2026年11月6日

摘　要

语言符号的使用与社会文化密切相关。本文以汉字“正”字的历史演变和欧美计数符号(Tally marks)为例，探讨不同文化背景下计数符号的社会功能差异。通过对符号任意性、语言世界观和高低语境交际理论的理论分析，本文发现，汉语“正”字五画一组的结构便于计数，但其在投票等场合所承载的公正、透明等联想，须结合具体制度和社会语境理解；英国符木制度则通过刻痕、劈分及双方持有的对应木片等方式，在特定财政与交易关系中提供核验凭据。两者并非分别代表中国与西方的固定文化类型，而是不同社会条件下符号实践的具体案例。两种不同的计数符号反映了各自文化在伦理体系和法律制度上的根本差异。

关键词

计数符号，符号任意性，符号的社会功能，文化比较

A Comparison of Cul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Chinese Character “Zheng” Tally Mark and Western Tally Marks

Yirui He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Received: September 22, 2026; accepted: October 27, 2026; published: November 6, 2026

Abstract

Language symbols are tied to their social-cultural context. Using the Chinese character 正 and Western tally marks, this paper examines how counting symbols function differently across cultures.

文章引用: 何伊蕊. 汉语“正”字计数与欧美计数符号的文化差异比较[J]. 现代语言学, 2026, 14(11): 57-63.
DOI: 10.12677/ml.2026.14111047

Through symbol arbitrariness, linguistic worldview, and high/low-context communication theory, it finds that 正's five-stroke grouping eases counting, while its connotations of fairness and transparency in voting depend on specific institutions and context. The English tally stick system provided verifiable records via notches, splitting, and matching halves held by each party, serving fiscal and commercial relations. Neither represents a fixed cultural type of China or the West; both are concrete cases of symbolic practice under different social conditions. Their differences reflect each culture's fundamental ethical and legal systems.

Keywords

Tally Marks, Symbolic Arbitrariness, The Social Functions of Symbols, Cultural Comparis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绪论

符号是人类文明的基础。无论是语言文字、数字体系，还是各种习俗象征，符号系统承载着文化的代际传递。然而，不同的文化在创造和使用符号时往往表现出截然不同的倾向。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曾指出，语言的多样性反映了民族精神的多样性。这一观点提示我们，对符号系统的研究不仅涉及语言学，更涉及文化人类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的多学科视角。

本研究选择两个极具代表性的计数符号系统作为切入点：汉语中“正”字计数的历史演变及其在现代社会中的社会功能，以及欧美文明中历史悠久的划线计数与符木制度。通过对这两个符号系统的纵向历史分析和横向文化对比，揭示出中西方在符号选择、改造和使用中的深层文化差异。这一探索不仅有助于理解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也能为跨文化交际和制度设计的比较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2. 理论框架

2.1. 索绪尔的符号任意性与理据性学说

瑞士语言学家费迪南德·德·索绪尔在其《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明确提出了语言符号的两个基本属性：任意性和二元性。根据索绪尔的论述，语言符号由所指和能指两部分组成，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即没有必然的逻辑联系[1]。例如，“树”这个汉语词汇与它所代表的植物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同样的植物在英语中被称为“tree”，在法语中被称为“arbre”，完全取决于各种语言文化社团的约定。

然而，在实际的语言社区中，符号的任意性并非绝对的。随着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演进，某些符号会逐渐获得理据性(motivation)，即符号的形式与其含义之间产生了某种可以理解的关联[2]。在本研究的两个案例中，我们都能观察到这一现象：汉字“正”字从纯粹的数字符号逐渐获得了公正、端正等道德含义，而欧美的划线计数则通过制度化的设计，赋予了符号的法律效力。

2.2. 洪堡特的语言世界观学说

洪堡特在其语言哲学理论中深刻阐述了语言结构与民族精神之间的内在联系。他认为，语言不仅是交流工具，更是民族思维方式和世界观的表现。不同民族的语言结构反映了各自独特的认知方式、价值观和对世界的理解。洪堡特的观点为现代人类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奠定了基础，也为我们理解不同文化

背景下符号使用的差异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在本研究的框架中，我们借鉴洪堡特的观点，认为中西方在符号创造和改造上的差异，深层反映了各自文明在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和社会组织方式上的根本不同。

2.3. 霍尔的高低语境交际理论

美国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在 20 世纪 70 年代提出了高语境和低语境文化的概念。这一理论认为，不同文化在信息传递时依赖于隐含语境的程度不同。在高语境文化中，信息的大部分含义隐含在语境、非言语符号和参与者之间的关系中，言语表达本身往往是简洁和含蓄的；而在低语境文化中，信息内容需要被明确、详细和直接地编码在言语或文字中，接收者依赖于这些明确的信息进行理解。

这一理论对我们理解“正”字计数和划线计数的差异也颇具启发意义。汉字“正”字的使用需要理解中文文化背景、对“正”字的传统道德含义的认知，因此是一种高语境的符号行为；而简单直观的划线计数符号本身就包含了全部含义，无需额外的文化背景知识，因此是一种低语境的符号行为。

3. 汉语“正”字的历史演化与社会功能

3.1. 先秦至唐宋：大数单位

汉字“正”字的最初用法出现在中国古代的数学和计数领域。根据汉代《数术记遗》的记载，在中国古代的大数单位系统中，“正”被定义为 10 的 40 次方数量级[3]。在这个阶段，“正”是一个纯粹的数学概念，类似于现代英语中的“million”“billion”等词汇，用于表示极其巨大的数。这个时期的“正”字仅具有数字的标记功能，并不涉及实际的计数操作。

在先秦至唐宋时期，中国的计数方法主要依赖于算筹(counting rods)和后来的珠算等工具。“正”字在这些计数系统中的角色是次要的，主要用于数学理论著作中对数量级的标记。在这个阶段，“正”字还未形成与伦理道德的关联，纯粹是作为一个抽象的数学单位存在。

3.2. 近代以来：民间计数符号

进入清末时期，特别是在上海等开放城市的商业活动中，“正”字逐渐演变成了一种民间的计数符号。根据商业史料和民俗学的研究，上海戏园、茶馆和商铺开始使用“正”字来记录顾客人数和账目，俗称案目制度与大水牌记账。这一变化标志着“正”字从理论性的数学单位转变为实用性的计数工具。

为什么商人们选择“正”字作为计数符号呢？这个选择并非偶然。首先，“正”字恰好五笔，暗合算盘、算筹等传统计算工具逢五进位的计算方式；其次，“正”字的笔画分布均匀、字形规则方正，不易与其他汉字混淆，这对于账目记录的防篡改具有重要意义；再次，“正”字本身具有端正、公正的道德内涵，这使得商人在使用这个符号时能够暗示其账目的真实性和合规性[4]。

在这个阶段，“正”字的功能和含义都发生了重要变化。它从单一的大数单位概念变为实用的计数符号，同时，“正”字所蕴含的道德含义，即平正、公正也开始渗入其实用场景中。“正”字不再仅仅代表数字 5，更隐含地象征了该笔交易的真实公允。这一阶段体现了中国文化中对符号进行伦理化改造的早期表现。

3.3. 现代社会：程序正义的象征

进入 20 世纪中期以后，“正”字进一步演变，逐渐成为了一种象征公共程序和制度正义的文化符号。在各种投票、选举、唱票等社会事务中，使用“正”字进行计数成为了一种约定俗成的规范。例如，在人民代表大会的表决中、在基层民主选举中、在各种民意投票中，记票员都倾向于使用“正”字来记录票

数。这一阶段的“正”字已经完全超越了其原始的计数工具属性，而是成为了程序正义、民主程序、社会监督的文化象征。当每一位选民在选票记录上看到以“正”字记录的票数时，所理解的不仅是一个量化的数据，更是对投票过程公正性和透明性的直观表达。“正”字在现阶段已经被赋予了强烈的制度和伦理意义。

这一演化过程与汉文化的伦理性特征紧密相关。汉字文化本身具有以字载道的传统，汉字不仅是记录语言的工具，更是传承文化和道德规范的载体。“正”字的演变完美体现了这一传统：一个日常的计数工具，通过文化赋义，逐步转变为道德和制度正义的象征。

4. 欧美划线计数与符木制度的演化

4.1. 史前起源：计数棒与刻痕计数

划线计数是人类最古老的计数方法之一。考古学研究发现，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就已经使用刻痕来标记数量。其中最著名的物证是伊尚戈骨(Ishango Bone)，远古人类在骨头、木棍上刻下刻痕，一道刻痕对应一个计数对象，放牧、狩猎、简单交易都可以使用，不需要复杂文字，直观易懂[5]。

为了更高效地清点较大的数目，人们自然地将五个刻痕分为一组，先画四道竖线(||||)，再用一条横线或斜线跨过它们(/)，代表一个完整的数字 5。从旧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刻痕计数法被广泛应用于放牧、狩猎和贸易中。木棍和骨头上的刻痕可以随时随地进行，无需复杂工具，这种简洁性使其成为了古代文明中最普遍的计数方式。每一条刻痕都是一个单位，多条刻痕组合而成的形式可以迅速被识别和计算，这种视觉的直观性是其他计数方法难以比拟的。

4.2. 功能成熟期：英国符木制度

欧洲中世纪发展出了一套成熟的计数和记录系统，即符木(tally sticks)制度。这一制度在英国尤为发达，从 12 世纪至 19 世纪，符木成为了英国财政部和商业活动中的正式记录工具[6]。

依据 Dialogus de Scaccario、英国国家档案馆(The National Archives) E402 档案、后世财政史专门研究，符木制度的运作原理大致如下：一根木棍被纵向劈开成两半，债权人和债务人各执一半。木棍上按照特定规则进行刻痕，不同面额的款项用不同宽度的刻痕表示[7]。如一英镑用最宽的刻痕表示，一先令用较窄的刻痕表示等。由于木棍被劈开成两半，双方各执的两部分在形状上必须完全吻合，这种物理的吻合性质成为了最有效的防伪和验证机制。任何篡改记录的企图都会立即在吻合对比中暴露无遗。

符木制度的优势是多方面的。首先，它提供了一种客观、可验证的交易记录，具有法律效力。英国的法律明确规定符木可以作为法庭证据使用。其次，它避免了书面记录可能存在的歧义和欺诈可能。符木上的刻痕不会因为字迹的相似而造成混淆，也不会因为笔墨的可编辑性而被篡改。除此之外，它对于不识字的普通民众也是完全可理解的，这在识字率较低的中世纪社会中具有重要价值。

符木制度对英语词汇的影响至今仍可观察。英文单词“tally”(计数、相符)源于此制度，“score”(记分、二十)则源于符木上的刻痕分组方式——每二十个单位，木工会在符木上作出一个特殊的标记以便区分。这些词汇的现存表明，符木制度在欧洲文明中的深刻影响。

4.3. 功能衰退与现代演化

1826 年，英国政府正式决定废除符木制度，改用纸质账簿进行财政记录。这一决定源于新兴的书写技术和会计方法的推进。然而，政府在集中焚烧陈旧符木时引发火灾，最终导致英国议会大厦几乎全部焚毁。这一事件成为了十八世纪英国历史上的重要插曲，也象征着符木制度时代的终结。

在现代社会，划线计数并未完全消失，但其功能已经大幅衰退。现在，划线计数主要出现在教室、

办公室的草稿纸上，或者在非正式的场合用来进行快速的计数。它不再具有法律效力，也不再是正式的记录方式。然而，划线计数作为人类最基本的计数方法，其简洁和直观的特性使其在日常生活中仍然保有一定的生命力。

5. 社会功能差异的文化解释

5.1. “正”字计数：符号的道德化

纵观汉字“正”字的演化历程，我们可以发现中国文化在符号使用时倾向于对日常符号进行伦理化和道德化的改造。“正”字从纯粹的数字单位，逐步演变成承载道德期待和社会监督功能的符号，这一过程也恰合汉文化的内在逻辑。汉文化的这一特点与汉字体系的整体特征密切相关。汉字是表意文字，每个汉字都包含着深层的文化意蕴。在汉字文化传统中，常常通过汉字的形体、笔画和寓意来传承道德规范和文化理想。在这一文化背景下，一个符号不仅是功能性的工具，更是道德价值和文化期待的载体。

因此，当“正”字被用于计数时，使用者和看到这个符号的人自然而然地会将其与公正、正直等品德相关联。这不是设计者刻意的编码，而是文化语境中的自然寓意。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寓意被强化和制度化，最终“正”字成为了制度正义和程序公正的文化象征。

这种符号的道德化策略反映了汉文化对于人的道德自觉性的期待。在这一文化框架下，公正和诚实不仅需要制度的保障，更需要人的品德和自律。符号的道德化正是通过视觉和心理的暗示，来强化和提醒人们的道德责任。

5.2. 符木制度：符号的制度化

相比之下，欧美文化在符号使用上则倾向于通过制度化和法律化的设计，来确保符号的可信度和有效性。符木制度正是这一特点的典型体现。

在符木制度中，符号的价值和可信度并非来自于其自身的道德含义或文化寓意，而来自于其作为形式程序的客观性和不可篡改性。符木被一分为二，双方各执一份，这种物理上的分割和匹配机制确保了记录的真实性。制度的设计者没有期待符号使用者的道德自觉，而是通过制度和程序的设计来防止欺诈的发生。

这一特点与西方文化中的制度信任理论密切相关。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研究表明，西方文化，尤其是低权力距离的文化，倾向于将信任建立在制度和程序的可靠性上，而不是依赖于人的道德品质。法律正义和契约精神是西方文明的核心价值。因此，符号的价值在于其能否提供客观可验证的证据，而不在于其是否能唤起人的道德意识。

5.3. 两种符号文化的根本差异

中国与西方在计数符号的社会地位和文化功能上呈现出两条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这两条路径深刻反映了各自文明在制度设计和文化价值观上的差异。

在汉字文化传统中，符号不是孤立的功能工具，而是与道德规范和社会期待紧密相连的文化载体。“正”字的发展演变正是这一特点的典型体现。从纯粹的数学计数符号，逐步演变为承载公正品德期待的社会符号，这一转变源于汉字体系本身的表意特征——每一个汉字都包含深层的文化寓意。当“正”字被用于记录投票数时，其字形本身所传递的端正、公正的精神内涵，便自然而然地被激活和强化，最终成为制度正义和程序透明的文化象征。在这一模式中，符号的社会功能从单纯的记录工具升华为道德提醒和社会监督的机制。

相比之下，西方文化倾向于通过符号形式本身的客观设计来确保社会制度的有效运作。符木制度的

设计理念充分体现了这一思路。符号的可信度并不来自其所代表的任何道德理想，而来自于制度程序的物理客观性，符木被一分为二，双方各执一份，这种形式上的对应与匹配机制确保了记录的真实性和不可篡改性。制度设计者并未寄望于使用者的品德自觉，而是通过明确的程序规范和制度约束来防止欺诈的发生。符号在这里获得了法律效力和制度强制力。

这两种模式各呈现出不同的社会效能与文化特征。道德化的符号设计充分发挥了文化的凝聚力，将社会成员的道德期待融入日常的制度实践中，形成了文化共识与制度认同的有机统一。同时，这种模式高度依赖文化传承和品德修养，一旦制度监督不力，便容易失效。制度化的符号设计则通过客观的程序保障，展现强大的普遍适用性和防错能力，即使在陌生文化中也能被理解和遵循；但其代价是可能显得冷漠和机械化，难以唤起人们的精神认同。这两种模式的差异本质上反映了中西方在社会组织逻辑上的根本区别：一种强调人文化的伦理约束与文化共识，另一种则强调制度化的法律保障与程序正义。

6. 结语

符号的演化是一个文化适应和社会创新的过程。中国的“正”字与欧美的划线计数两种符号系统虽然都服务于计数和记录的基本功能，但其在社会中的地位、使用规范和承载的文化含义却大相径庭。这种差异本身就值得深入思考，因为它揭示了人类社会组织的两种不同逻辑。

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看，符号的社会功能取决于三个层面的因素。其一，符号本身的形式特征，如“正”字的五画结构，划线符号的简洁直观等；其次，符号所嵌入的文化网络，如中国社会重视伦理道德，欧美社会强调法律权威；最后符号的使用者也对这些文化因素赋予了新的理解和认同。这三个层面相互作用，符号才逐步获得了超越其原始功能的社会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在全球化和数字化的时代，这两种符号系统正在经历新的变化。数字技术带来的可追溯性和透明性，使得符号的验证机制发生了深刻变化。在大数据时代，每一条交易记录都可以被完整地存储和追溯，这种客观的技术性保障似乎更接近西方的制度化逻辑。但区块链技术中的智能合约却体现了对参与者品德和承诺的新形式期待。种种现象表明，在信息技术的影响下，全球文化可能正在经历一种新的符号意义的融合。

从中文教育和传播的角度看，符号的理据化过程也为我们理解符号学习和跨文化交际提供了启发。汉语学习者要理解“正”字在中文中的多层含义，不仅需要学习其基本的计数功能，还需要深入理解汉文化中道德与公正的内涵。这要求国际中文教师在教授汉字时，不能仅仅停留在字形字义的表层讲解，还应当挖掘符号背后潜藏的文化价值。跨文化交际场景下，符号误解常常成为隐形的沟通障碍。汉语学习者若只知晓“正”字一笔代表一个计数单位，却不了解它附带的公正、透明的文化隐喻，便无法完整读懂中国选举计票场景下的符号实践；同理，英语学习者接触西方传统符木制度时，如果只看见简单刻痕计数的工具属性，忽略其背后契约、证据优先的制度逻辑，也难以理解西方法律文化的底层思维。

本研究的发现对于制度设计同样具有重要启示。当代中国在完善法律制度的过程中，常常面临着如何将传统的伦理道德机制与现代的法律规范相融合的问题，同样，西方社会在处理多元文化问题时，也越来越意识到制度化的程序正义如果缺乏文化共识的支撑，往往显得生硬而低效。这表明，在当代社会治理中，既需要明确的制度规范和程序保障，也需要对文化共识和伦理期待的尊重与培养。

符号从来不是中立的工具，它是镌刻在日常行为中的文化密码。理解不同符号背后的文化逻辑，也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看待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推动跨文化的理解与沟通。

参考文献

[1] 索绪尔. 普通语言学教程[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2] 王德春. 论语言单位的任意性和理据性——兼评王寅《论语言符号象似性》[J]. 外国语, 2001(1): 74-77.

[3] 于春英. 浅谈中日两国使用“正”字计数的渊源[J]. 文教资料, 2008(5): 45-46.

[4] 沉碧. 高大上的“正”字计数法[J]. 初中生学习(高), 2015(6): 11.

[5] 桂质亮. 古代数学符号的发展与演变[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1989(3): 134-142.

[6] 孙晗, 郭俊. 符木记刻方式与会计的历史渊源初考——评罗德夫·罗伯特《符木记刻简史》[J]. 财会通讯, 2014(4): 117-120.

[7] Hsieh, H. (2012) Chinese Tally Mark. *The American Statistician*, **35**, 174-174. https://doi.org/10.1080/00031305.1981.10479346